

辽宁教育出版社



巴别尔 著

傅仲选 译

红色骑兵军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巴别尔 著
傅仲选 译

红色骑兵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骑兵军 / (俄) 巴别尔著; 傅仲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96-5

I. 红… II. ①巴… ②傅… III. 短篇小说—作
品集—俄—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296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 数	25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任何诋毁攻击都无法消灭真正的艺术

——译者前言

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红色骑兵军》作者巴别尔荣登榜首。以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而跻身于世界小说大师之列，在苏联文坛上恐难找到第二个人。

巴别尔从一九二三年起，开始在《敖德萨……消息报》及《列夫》、《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发表描写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的战斗生活和反映革命前他的故乡敖德萨的犹太贫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汇编成《红色骑兵军》（一九二六年）和《敖德萨的故事》（一九三一年）两个集子。巴别尔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一场大辩论。以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元帅为首的一些红军将领强烈指责巴别尔，说他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匪帮，说他的小说是对骑兵军的诽谤和诬蔑，说只有白匪和反革命分子才这样来写红军，等等。他们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等人的批评毫无说服力，只是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在一九二四年第五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伊·巴别尔》一文，对巴别尔的创作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同时逐一批驳了布琼尼等人对巴别尔的指责。他说“这类指责是基于一系列误解之上”，这实际是说布琼尼等人不懂文艺，对巴别尔瞎乱指责。一九二四年末，在出版之家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关于巴别尔《红色骑兵军》主人公的座谈会”。会议由评论家波隆斯基主持，布琼尼亲自参加。与会的有富尔曼

诺夫、沃隆斯基、什克洛夫斯基、谢夫林娜、李别进斯基等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意大利索伦托回国，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从而掀起了关于《红色骑兵军》的第二次大辩论。高尔基说：“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同志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营地哥萨克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布琼尼很快作出反应，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布琼尼在信中全盘否定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认为作者看不到国内战争中战士们活生生的真实形象，而且有“色情狂”的特写镜头。高尔基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对布琼尼的《公开信》逐条发表自己的看法。高尔基对《红色骑兵军》给予全面肯定的评价，并批评布琼尼说“您那封信以刻薄而无理的语调使一位青年作家受了他不应蒙受的侮辱”。在回答布琼尼的“讽刺与诽谤”的指责时，高尔基说“我在巴别尔的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

长期以来，人们对《红色骑兵军》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高尔基等人对它及其作者评价极高。高尔基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给阿·阿·杰米多夫》的信中称赞“巴别尔是有才气和聪明的。从他身上是可以期待许多东西的……”沃隆斯基在《伊·巴别尔》中称“巴别尔是现代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最大的希望，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流的苏联散文作家”。

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尔于一八九四年出生在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里。十六岁前一直学习犹太语、《圣经》和塔木德。在敖德萨商业学校上学时，他阅读了大量俄国和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特别热衷于福楼拜的作品。一九一五年，他去了彼得堡并开始写小说。一九一六年，高尔基在其主编的《年鉴》月刊上发表了巴别尔的两个短篇小说（《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科菲耶夫娜》和《妈妈，里玛和阿拉》）。巴别尔深受鼓舞，此后他常把自己写的作品送给高尔基，高尔基耐心看了他写的每一个短篇，但都不满意而未予刊登。最后，高尔基劝他“去人间”。巴别尔听从了这一劝告，在人间跌打滚爬了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在罗马尼亚前线当过兵，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在第一骑兵团中服过役，还当过编辑和采访记者。“去人间”七年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给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一九二三年，巴别尔重新开始写作。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巴别尔在各种报刊上共发表短篇小说三十四篇。这些作品立即被认为是杰作，巴别尔也成了著名的青年作家。沃隆斯基在《伊·巴别尔》一文中写道：“巴别尔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新成就，是相当重要的和十分令人振奋的成就。巴别尔尚无《选集》问世，但是 he 已发表的 100～120 页作品显示出他是一位相当成熟的作家。”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单行本问世，共收入短篇小说三十四篇（在以后的版本中增补了《阿尔加马克》和《吻》两篇），小说出版后即被译成二十种文字。一九三一年《敖德萨的故事》也出了单行本。除短篇小说外，巴别尔还写过电影剧本《别尼亚·克里克》（一九二六年）、《漫游的星星》（一九二六年），剧本《晚霞》（一九二八年）、《玛丽亚》（一九三五年）。

三十年代末，厄运降临到巴别尔的头上。一九三九年五月，他突然被捕，一九四一年死于服刑期间（另一说法是，巴别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夜在莫斯科被枪决）。他的作品也被禁止出版。一颗耀眼的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一九五四年底，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作出为巴别尔平反并恢复

名誉的决定,他的作品才又重新与读者见面。一九五七年苏联出了他的第一个选集,其中收入《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和《故事集》,爱伦堡为选集作了序。选集很快卖光,成为珍本。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八六年又再版该选集。选集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后,国外出版社立即用电版复印,在广大西方读者中流传。一九七九年,美国尼古拉斯·斯特劳德教授又将巴别尔发表在报刊上而未成集的作品六十多篇收集成册出版,取名《被遗忘了的巴别尔》。巴别尔二十年代一举成名,三十年代突然销声匿迹,含冤离世后二十年又被人们记起,其作品被一版再版。这说明巴别尔作品的不朽的艺术价值,任何诋毁攻击、政治迫害都不能消灭真正的艺术。巴别尔的作品及其思想是永恒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苏州

伊·埃·巴别尔

伊利亚·爱伦堡

巴别尔的作品在停版多年——几乎二十年后，现在又问世了，连这位大作家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一代，现在可以读到三十年前曾经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早期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一六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去世前一直关怀他的创作道路。而广大读者知道巴别尔则要晚些，是在一九二四年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青年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之后。此后不久《红色骑兵军》问世。一九二六年我与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认识时，他已深知名望的负面作用，常常躲避那些过分纠缠的崇拜者了。《红色骑兵军》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巴别尔的名字开始远扬国外。一九二八年，罗曼·罗兰写信给高尔基谈起他。一九三五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巴黎国际作家代表大会。我记得，他受到亨利·巴比塞和亨利希·曼、让-里夏尔·布洛克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人异常热烈的欢迎。在苏联和国外读者看来，他是自己时代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像他。他总是写自己，总是按自己的方式写作。他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写作手法，而且还在于其对世界独特的认识。他的所有作品都来自生活，他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久前我得到一本巴别尔一九二〇年的日记——那时他在第一骑兵军。青年作者在日记中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地印象。《红色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格达利》描写一个古董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以为这个短篇是浪漫

主义的虚构，而日记则说明了《格达利》产生的背景：一九二〇年七月三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遇见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小个子犹太人——哲学家。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店——狄更斯、扫帚、金鞋。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自己为真理而战，其实大家都在掠夺。”在《红色骑兵军》的另一短篇《军马储备局局长》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他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马储备局局长季亚科夫——一幅美妙的画像，一条镶银色（饰条的）红（色）灯笼裤，雕花腰带，斯塔夫罗波尔人，阿波罗的体型，（短）小灰胡子，四十五岁……当过演员……关于马……”三天后写道：“季亚科夫来了。说话简短：这种马你可以领取一万五千卢布，这种马——二万卢布。要是能站起来，说明这是匹马”。如此准确地描写现实的作品现在大概叫“特写”吧。当时巴别尔的短篇总使我们感到惊讶，有时觉得它们近似幻想作品。他觉察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他语出惊人。有些作家力图把寻常的事物写得不寻常。有些作家想用寻常的声音讲述不寻常的事物。巴别尔则用不寻常的声音描述不寻常的事物。巴别尔简短而又扣人心弦地展现出人的漫长的一生，其中非凡被平凡冲淡，悲剧性被习惯性削弱，就像香精被水稀释一样。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他独独钟情短篇小说。他仿佛在用探照灯照射人生的一小时，有时一分钟。他摄取人暴露得最充分时的那些镜头。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炽烈的爱情和死亡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著地反复出现。

他写得极慢，对自己过于严格。他留下三本薄薄的故事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作品外，他的小说一般都描写了震撼他心灵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他参加过的第一骑兵军的征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热爱故乡的城市，革命前夕他写道：“敖德萨有极度贫困、人口众多、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区，有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和黑帮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傍晚甜蜜醉人，金合欢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月儿从昏暗的天空泻下一片柔和的清辉……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停泊着来自纽卡斯尔、加的夫、马赛和塞

得港的海轮；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得萨有过繁荣的时代，现在正经历衰退期，一种富有诗意的、带点无忧无虑而又完全束手无策的衰退期。”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匪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布卡哥萨克，疏懒成性、鼠目寸光的怪人们和恶棍骗子们，爱说俏皮话的人们和猎取幸福的人们，他们都不是诞生在作家的书斋里，而是围绕在少年巴别尔周围。《我的鸽子窝的故事》最初是一个小孩的感受，后来由一个聪明的成年高手讲述出来。

革命前，敖德萨被视为笑话的故乡。在苏维埃时代，它给俄罗斯文坛输送了一批才气横溢的作家：巴别尔、巴格里茨基、伊利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鲜明，幽默，充满火热、苦涩和浓烈的生活感受。

《红色骑兵军》中没有对革命的律师式的辩护，再说革命也不需要这样的辩护。《红色骑兵军》的主人公有时残酷无情，有时滑稽可笑，他们身上洋溢着猛烈的春汛。但是他们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事业的正义性贯串全书，虽然作者和主人公们对此均只字未提。巴别尔笔下的《红色骑兵军》战士，不是我们在苏联文学中常见到的那些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既有优点，又有毛病。如果说上世纪某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的一些苏维埃作家则被森林挡住而看不见树木。《红色骑兵军》中急流滚滚，怒涛汹涌，风暴呼啸，书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高尔基写道，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要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营地哥萨克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的确，在读《盐》或《多尔古绍夫之死》时，很难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对于老天主教徒称作“肉欲”、而现代清教徒名之为“兽欲”的那种爱情，巴别尔写得十分直率，毫不虚假羞涩。巴别尔把丘特切夫诗中的“忧郁暗淡的欲望之火”引到自己身上，因为这火始终照耀着人的面孔，而不是他的面具。不能把巴别尔对莫泊桑的爱看成是对这位法国作家

写作手法的喜爱。要说巴别尔与哪些外国作家相似,我认为他更接近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考德威尔、斯坦贝克。和他们一样,巴别尔力图描写人,而不是叙述人。和他们一样,他避免使用作者议论,而重视对话。但是据我所知,巴别尔对美国文学并不感兴趣,而对莫泊桑却推崇备至。我曾不止一次亲眼看见他和那些不喜欢《俊友》作者的法国作家热烈争辩。他推崇莫泊桑表现了爱的力量,推崇他的直率:“莫泊桑也许什么也不知道,也许——什么都知道:一辆公共马车在烈日熏烤的大道上辘辘行驶,车内坐着肥胖狡猾的小伙子波利特和一个健壮笨拙的农村姑娘。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和为什么干——这可是他们的事情了。天空火辣辣,地上火辣辣。波利特和姑娘大汗淋漓,而公共马车在烈日熏烤的大道上辘辘行驶。就是这些。”

虽然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期也曾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但他首先是短篇小说大师。在产生“长篇小说巨流”的时代,在词语贬值的时代,他最怕长篇大论。他善于用两三页的篇幅讲述似乎要花整整一厚本才能讲完的东西。他小说中的对话异常独特鲜明,有时一句话就揭示出人物的内心面貌。

一个卖黑戏票的富翁的妻子被意大利悲剧演员的表演深深打动,走出剧院时责备自己的丈夫:“浪荡子,现在你该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了……”

管院子的库兹马告诉小孩,他的堂祖父在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中被打死了:“我们家老爷子给打死了,就他一个人给打死了,他破口大骂这帮家伙,骂得他们狗血喷头,真是好样的……你最好给他眼睛上放两个五戈比硬币……”

在看到一个个快死的战士时,红军战士格里修克叹息道:“为什么娘儿们要劳动?为什么要提亲、结婚,为什么干亲家们在婚礼上大吃大喝……我真觉得好笑,为什么娘儿们要劳动……”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熠熠,他像我们时代的某些写生画家那样寻找鲜明的色彩。他不怕过头,他对艺术的态度反映在短篇小说《迪·

格拉索》中：小说描写西西里悲剧演员的演出，他不讲分寸，但却征服了全场观众。早在一九一五年，巴别尔在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曾说过，他在文学中追求太阳和全色彩，赞赏果戈理的乌克兰短篇小说，惋惜“彼得堡战胜了波尔塔夫希纳。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谦恭地、但却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抹掉了格里茨科……”对习惯于俄罗斯散文的拘谨、腼腆的人来说，巴别尔笔下的形象恰似热带的鸟儿一样奇异。要说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渊源，最好回忆一下早期的果戈理。

三十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探索果戈理在写了系列乌克兰短篇故事之后所走的创作道路。他常常说，早先他写得过于华丽，滥用了形象，需要十二分的朴素。从优秀短篇《石油》我们可以窥见巴别尔后期作品的一斑。一九一六年，高尔基劝这位文坛新手多研究一点生活，巴别尔有七年没有给报刊寄过一篇东西，尽管他仍继续写作。沉默时期重又开始了：从一九三六年起几乎不再出现他的作品，而他却做了大量工作。他照常严格要求自己。他致力于长篇小说，写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一九四一年，时年四十二岁。

他个子不高，粗壮结实，总戴一副眼镜，他那极富表情的眼睛透过眼镜时而闪耀着调皮的亮光，时而流露出忧郁的神情。他对生活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各种事物都能吸引住他。他广交朋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不大像一个职业作家。他能一连几小时倾听别人的爱情故事，幸福的和不幸的。他喜欢跑马，每当从马旁走过时心里总是痒痒的。关于他的战友赫列布尼科夫，他写道：“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我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五月的草地，是妇女在其上嬉戏、马儿在其上奔驰的草地。”

他懂多种语言，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但是书本任何时候也没有挤掉他对真正生活的兴趣。一九三五年，我在报纸上撰文描述巴别尔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巴别尔没有读自己的发言稿，他用法语自由

流畅、生动形象、口若悬河地讲着，在十五分钟内讲了几个未见诸文字的故事，引起阵阵哄堂大笑。人们在笑声中明白了，他表面讲的是一些愉快的故事，其实是在讲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已经有了粮食，他有了房子，他甚至有了勋章。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他现在想有人写诗歌颂他……”

巴别尔是位了不起的故事大王，遗憾的是，没有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一九三八年冬，在莫斯科，他常到我这里来讲各种趣闻……当时我想，他会把所讲的一切都写下来的。命运却不是这样决定的。

他喜欢躲开亲朋好友，喜欢“捉弄”人。他的生活有时像鼯鼠的行踪。他躲藏起来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有几个月他住在巴黎郊区，向一个法国老姬租了一间房。她误以为他是个凶犯，是和别尼亚·克里克一路的货色，因此晚上睡觉前把他像囚犯一样锁起来，以免遭他杀害。这使巴别尔哭笑不得，但是他喜欢这个房间：清静，可以写作。

他喜欢安静，但却过着不安静的生活，打仗，东奔西走，了解自己时代的一切希望，一切痛苦。他欢迎革命，认为它能实现他所珍贵的理想，至死都保持对正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理想。

“朋友”一词和任何一个词一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精神高尚的人，从不会出卖朋友。我十分有幸能跟他多年保持友谊。一九三二年我写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常来我这儿。要是我再不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会很痛苦的……

伊·巴别尔的短篇小说还将长期流传，人们将反复阅读它们。这是崇高的艺术。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俄国的伟大作家有某些相似的东西：人道主义，努力捍卫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短暂而一去不复返的生命。在短篇小说《格达利》中，老人说：“而我想要的是好心肠人的共产国际，我希望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发给他一定量口的口粮……”这也是巴别尔本人的期望。他生活在一个崇高而又异常艰苦的时代。他不仅相信未来，而且为之奋斗。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个优

秀短篇《卡尔-扬克利》的结尾写道：“我在这些街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克利了，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像现在为他争斗那样为我争斗过，因为没有人对我感兴趣。‘不会的，’我自言自语，‘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克利……不会的，你不会不比我幸福的……’”

巴别尔的读者将带着感激之情怀念他。他希望他们幸福，为他们的幸福而斗争。

自 传

我于一八九四年出生在敖德萨市郊摩尔达万卡，是犹太商人的儿子。由于父亲的坚持，我学习犹太语、圣经、塔木德直到十六岁。在家的日子真难熬，因为从早到晚都被逼着读各门功课。我在学校才能得到休息。我读书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在该校就读的有外商子弟，犹太经纪人的孩子，威风凛凛的波兰人，古老信徒派教徒和许多超龄台球迷。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去港口栈桥上玩，或去希腊咖啡馆打台球，或去摩尔达万卡小酒馆喝廉价比萨拉比亚葡萄酒。我忘不了这所学校，还由于那里的法语教员是瓦东先生。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才能。他教我法语，我跟他熟读了法国经典作家，与敖德萨的法侨接近，并从十五岁起开始写法文短篇故事。我写了两年，但后来放弃了；我的故事中的农夫形象和作者的思考写得苍白无力，我觉得只有对话较成功。

商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一九一五年到了彼得堡。我在彼得堡的处境糟透了，我没有居住证，常常躲避警察，寄居在普希金大街上一个小酒馆里，和一个心灵创伤很重、成天醉酒的堂倌住在一起。于是在一九一五年我开始给多家编辑部投稿，但是稿子纷纷被退了回来，所有的编辑（已故的伊兹梅洛夫、波谢等人）都劝我去小铺做事，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于是在一九一六年底我去找高尔基。真是多亏了这次会见，至今我都怀着爱戴和尊敬的心情来说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个名字。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的《年鉴》月刊上发表了我最初的两个短篇（我因这两个短篇受到一〇〇一条款刑事责任追究），他使我懂得了一些非